

孙中山第一次护法运动与海军

郑

焱

1917年7月,孙中山以“护法”为号召,开展反对北洋军阀反动统治的斗争。由此伊始的护法运动中,海军的动态是引人注目的,尤其是1917年—1918年的第一次护法运动中,海军的向背,对护法的成败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以往,研究者对此虽有所涉及,但一般语焉不详,致人们对护法的始末因果,未能窥其全豹。笔者不辞浅陋,谨就这一课题进行探索,稍尽拾遗补阙之意,藉使护法运动的研究得以完善,有所进展。

1916年,袁世凯在举国声讨的浪潮中忧惧死去,但继之而起的段祺瑞承接了袁世凯的衣钵,先后两次拒绝实行民元《临时约法》,并企图通过对德宣战,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扩张自己的势力,叫喊武力统一,企图建立北洋派军阀独裁统治。段氏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孙中山严正声明“民国与叛逆不能两存”,誓“与宪法共死生”,高举“护法”的旗帜,发动了第一次护法运动。在这次运动中,孙中山试图依靠海军和西南各实力派作为支持自己的两大军事力量。因此,他在争取唐继尧、陆荣廷等西南军阀参加护法的同时,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来致力于罗致海军舰队。

海军在当时国内的一系列重要政治问题上表现出了明显的反段倾向,这是孙中山相信能够依靠它来对抗段祺瑞以进行护法运动的基础。

1916年夏段祺瑞上台伊始就宣称将以袁氏民三约法“为行政之准”,并自仗有各省北洋派督军的支持而置孙中山、梁启超等人的强烈反对于不顾。但出乎他的意料,6月25日驻沪海军总司令李鼎新,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懌,练习舰队司令曾兆麟暨各舰长联合通电宣告独立,“非俟恪遵元年约法,国会开会,正式内阁成立后,北京海军部之命令,概不承受。”^①海军的独立,直接威胁到北洋势力控制下的东南沿海各省,而且广东护国军也很可能利用海军运兵北上进入北方心脏地区。慑于海军的威力,段

祺瑞被迫在29日公布恢复《民元约法》。但次年5月,为了迅速取得日本帝国主义的巨额贷款,更快地扩大自己势力的目的,段祺瑞又指使暴徒包围国会,殴辱议员,企图强行通过对德宣战案。第二天,孙中山和章炳麟即致电北京政府要求“严惩凶手”,“庶保国会尊严。”时任海军总长的程璧光也立刻和伍廷芳等其他阁员共同提出辞呈,使内阁仅剩段祺瑞空头“总理”一人,实际处于瘫痪状态。是月23日,黎元洪终于下决心命令免去段祺瑞内阁总理职。各省北洋派督军相继助虐,宣布“独立”,并借口调停,再次扰乱民国。海军当即派遣军舰前往安庆江面,镇慑首先倡乱的皖督倪嗣冲。驻沪海军总司令萨镇冰召集在沪舰长紧急会议,声明反对北洋派督军的跋扈行为。海军的这种态度,使孙中山很受鼓舞,认为“海军拥护共和,义声久著于全国”,自信完全有把握争取他们一起反段护法。

第一次护法运动中,孙中山主要通过程璧光这个关键人物来联合海军。程璧光字玉堂,早年毕业于福州水师学堂,属海军前辈,1916年起任海军总长,在海军中声望较高。他比孙中山年长七岁,同是广东香山人士,以前两人曾有过交往。1917年6月10日当北洋督军团反叛,黎元洪地位岌岌可危时,程璧光离京到达上海巡视海军,以保证海军拥黎反段,对督军团施加压力。孙中山在程璧光来沪前,已经开始着手运动沪上海军舰队,但进展不大。程的抵沪,给孙中山带来新的希望,以为“现在国家之武力在海军,而海军之权力在程总长”,^②只要争取到了程璧光,就等于争取到了海军。23日,孙中山主动函邀程璧光到哈同花园会商大计,共进晚餐,从而奠定了双方联合行动的基础。这次会晤,引起了上海各方的注意,《民国日报》含蓄地透露,“海军方面前由旅沪某巨公接洽,不日宣言护法讨逆”;西文《大陆报》因此评论“南方一动,则海军将为有力武器之一。”^③7月1日,张勋悍然冒天下之大不韪拥废帝

溥仪复辟，黎元洪仓惶出走，形势骤变。3日，孙中山在上海寓所邀集程璧光、林葆懌及其他海陆军官会议时局，讨论对策。会议中程璧光代表海军陈言：“中国人决反对满清专制复活，至海军全体誓不承认帝制，”孙中山补充指出：这不但是共和与帝制之争，还是全体国民反抗武人专制之争^④。通过这次会议，海军决定和孙中山一起通电全国讨伐叛逆，南下护法，孙中山联合海军的目的终于达到。与此同时，廖仲恺等人也为此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据何香凝回忆，当时“孙先生深深觉得没有武装力量，不足以与北洋军阀对抗斗争，无由贯彻救国救民的宗旨。所以他几次与当时在上海的海军总长程璧光磋商，希望海军也参加护法的行列。仲恺协助孙先生运动北洋海军军官彭春源等南下护法，我则分配做北洋海军的妇女家属工作。我在哈同路的寓所里接待一些海军家属，对她们讲解护法的必要，配合做些说服动员工作。”^⑤

海军决定参加护法后，7月6日，孙中山和章炳麟、朱执信等登海琛军舰南下广州，动员了广东省长朱庆澜等先后致电上海请海军“移师粤海”。22日，程璧光和林葆懌率第一舰队部分舰只离沪赴粤，并通电全国发表海军护法宣言，以三事自矢：一、拥护约法；二、恢复国会；三、惩办首恶。海军这一举动，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中西各报争相登载消息，发表评论。南方护法人士誉之为“全国护法之第一声”，“与民国关系极巨”，对程璧光所率舰队抱有“无穷之希望与信赖”^⑥，在华外国通讯社认为“第一舰队加入南方，以既有之民党加以两广实力以对抗北方并不困难”^⑦。北京段祺瑞政府得到海军南下消息后则立即召开临时紧急会议，一面加紧控制其余海军，防止它们也随之下，一面派萨镇冰等发电劝阻护法舰队赴粤，但均遭拒绝。8月5日，护法舰队安抵广州，孙中山偕到粤国会议员及广东军政商学各界代表“均出黄埔外五里许欢迎之”，一时“鞭炮之声不绝，十里天日为红”^⑧，护法声势由是而大振，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护法运动宣告正式开始。

关于程璧光率海军随孙中山南下护法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尚有几个问题值得讨论。

一、海军参加护法，是使孙中山决心以广州为护法基地的最主要因素。孙中山在护法运动中一向认为：要护法成功必须有两大伟力，“其一为陆

军，其二为海军。”^⑨所谓陆军，主要是指滇桂等西南军阀的武装。孙中山在1917年5、6月接连致电陆荣廷、唐继尧，劝导他们“克日誓师，救此危局”^⑩，并特派胡汉民专程赴粤桂和桂系督军陈炯明等会商，得到了想借护法之名扩大自己势力的西南军阀表面上的赞同，但至此孙中山并没有表示准备离开上海去南方建立护法基地的意思。相反，沪上报纸却不断报道旧国会议员将来上海召集会议，上海即将成为政局中心的消息。7月3日在孙中山寓所举行的会议上，唐绍仪还提出将合法政府迁至上海的意见，马鸿烈则建议于上海设立陆海军总机关，可见在一般人士中仍主张以上海为护法根据地。但是，由于海军最终决定参加护法，为海军计，以上海为基地是不适宜的。其时任淞沪护军使的卢永祥属北洋皖系，6月初随倪嗣冲等宣告“独立”时就曾要求所有海军舰只驶离吴淞，故海军和他久存芥蒂。程璧光曾经公开宣称上海已是“不便讨论国事”的地方。另一海军基地福州，则由于福建督军李厚基也属皖系军阀，是段祺瑞得力大将而同样不适宜海军驻泊。因此，护法海军建议，如果西南方面能够表示欢迎，海军愿意将舰队“移驻广州，以两粤为护法根据地。”孙中山以海军意愿为是，但又考虑到两广是桂系陆荣廷掌握的势力范围，对实力雄厚的海军的进入，“与之协商，恐不允许，”于是决定由他先亲自去说服广东各方，为海军南下扫除障碍。7月6日孙中山毅然登舰，17日抵穗。当天晚上孙中山即在黄埔公园欢迎会上发表演说，主要内容有两点，皆围绕海军而发：（1）要争回真共和，非得有海军的参加不可，现在“幸得海军全数将士效忠共和”，护法得以有望；（2）护法海军必须有一根据地，但上海、浙江、福建都已“为一般称兵谋叛者所割据，”所以“只有以广东为海军根据地，然后一切大计划可以发展。”孙中山呼吁“鄙人今日所望于诸公者，即日联电，请海军全体舰队来粤。”^⑪从这些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孙中山主要是为了争取海军才决定去广州领导第一次护法运动的。1917年随孙中山广州护法的原国会议员汪建刚曾回忆“中山先生既掌握了一支雄厚的海军武力，乃思护法政府之地点以靠近海口为宜。当时考虑到上海、宁波、汕头等地均不如广州，故最后决定在广州。”^⑫更可以证明这一点。

二、程璧光所率护法海军究竟于哪一天驶离上

海。一般论著都认为是1917年7月21日，其实有误，确切时间应是7月22日凌晨。查上海《民国日报》在7月23日登载的消息“前日清晨（21日）程总长登海圻旗舰即拟率各舰驶出吴淞口向广东前进，继因雾重未即开行，宣言书亦即缓发。本报前夕访得宣言书底稿，继知各舰尚未启碇，故昨报遂未发表。至昨日黎明（22日），全舰队乘风破浪向广州而去。”^⑩这里说明：（1）护法海军原定21日离沪，因气候关系而到22日才得以成行；（2）报纸本准备22日披露海军护法宣言，因海军行期改变而推延，23日沪上各报才相继登载。上海《民国日报》为于右任、叶楚傖等孙中山系人士所办，和护法海军素有交往，消息应该是可靠的。同日（23日），《申报》也报道了海军南下消息，“海军将士为拥护约法之故，于前日决议发布宣言，由程璧光、林葆懌率第一舰队赴粤与西南取一致行动，嗣因雾重，未即开行，至昨晨黎明，全舰队始启碇赴粤，并通电各省，闻唐少川，汪精卫两君偕同往粤。”^⑪《东方杂志》第十四卷第九号《中国大事记》中1917年7月21日条记程璧光于是日宣言护法，“翌日（22日）率全舰队开赴广东，并有唐绍仪，汪兆铭诸人同行”^⑫，亦可佐证。

三、南下护法海军的力量问题。大多数近代史论著在叙及海军参加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护法运动时，都认为程璧光率领了第一舰队全体加入，这并不正确。当时中国海军部有三个直属舰队，一是海防舰队，即第一舰队，吨位最巨，实力最强；二是长江舰队，即第二舰队；三是练习舰队，仅有三艘军舰，但其中肇和舰排水量为二千六百吨，也属大型舰只。除此之外，还有鱼雷舰艇队，小铁甲炮舰队及广东、福建等省属江海防舰队。程璧光所率参加护法的是第一舰队海圻、海琛、永丰、同安、豫章、永翔、飞鹰、舞凤、福安等舰，第二舰队应瑞、楚豫等舰，共十余艘。第一舰队本有“海”字号大型巡洋舰四艘——海圻、海琛、海容、海筹，但南下的仅海圻和海琛两舰。从吨位看，护法海军共约一万三千余吨，占全国三个主要舰队总吨位的一半尚不足；是年10月，肇和舰抵粤参加护法，护法舰队总吨位才得以略过半数。而且海军陆战队也未能动员南下参加护法，更对舰队战斗力有所影响。正因为海军没有一致行动，段祺瑞政府在得悉程璧光率部分海军随孙中山赴粤时，震惊之余，仍可故作镇

静态度，声言“海军独立不过其一部分，不足视为重大之事。”^⑬程璧光也曾为此对人说“吾提海军南来，仅一部分耳，吾之能力有限，至为可憾事”^⑭，这反映了当时的客观情况。

四、程璧光为什么要率领海军参加护法？以前几成定论的观点是因为他拥护孙中山的护法主张，所以追随南下。但笔者认为：程璧光之所以要带部分海军依附孙中山，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一是出于拥黎反段的目的，二是为了解决海军军饷问题。

1895年甲午战败后，程璧光被撤职归籍，由于医伤而和孙中山等人有所交往，并在他弟弟程奎光的再三劝说下勉强加入了广州兴中会分会。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程奎光惨烈牺牲，程璧光因惧受牵连而远避南洋，与革命党人中断了联系，因此他和孙中山的关系远远比不上和黎元洪的关系那样深厚。晚清时，程璧光、黎元洪都曾在海军供职，黎还是程的直属部下，两人“同事有年，意甚相得”。程璧光得以在1916年任海军总长职，就源自黎元洪的极力推荐。以后的“府院之争”中，程璧光始终站在黎元洪一边，深招段祺瑞的忌恨。1917年6月，黎元洪撤段祺瑞国务总理职，北洋督军团聚集天津以武力威胁北京，程璧光受黎元洪命离京赴沪，集中海军相机行事。7月1日，张勋复辟，程璧光立即派海容等舰北上迎黎脱险，并电请日本公使护送黎元洪出京，但遇阻未成。当南京冯国璋欲代黎行使总统职权时，程又去电反对，称“海军直隶於大总统，本总长奉大总统命而来，大总统尚在，即大总统之号令未绝”^⑮。表示自己只奉黎元洪之命行事而不受他人统辖。7月3日在孙中山寓所讨论护法事宜时，孙中山的本意是建设一个临时政府，自己“复称临时大总统”，以此来更好地统一领导全国的护法运动，这个主张得到章炳麟的赞同，但遭到程璧光等人的反对。程璧光坚持黎元洪仍是政府总统，孙中山只有“起兵讨贼”的权利，其余则非他“所敢知也”^⑯。因为需要借重海军的力量，孙中山接纳了程璧光等人在广州召开国会，然后请黎元洪到粤执政的主张，放弃了自己再任临时大总统的打算。程璧光在广州时，还对人说：这次海军南下护法，以公而论是为了国家共和，以私而言则是因为见黎元洪被段祺瑞压迫过甚，他不得不起而援助所致。但是黎元洪在张勋复辟后即藏匿不出，实际上已失去了总统的职权，海军能暂时依附的反段政

治势力只有孙中山较为合适,这是程璧光率舰队追随孙中山护法的原因之一。

另外,自从程璧光离京赴沪后,他就脱离了北京政府,要发动海军拥黎反段,首先就得解决舰队的军饷费用问题,否则,不但会使舰队军心动摇,甚至可能产生哗变,所以程璧光急于找到能提供军费的依靠。海军在和孙中山会商联合时,首要条件就是孙中山必须保证海军“饷项有着”。孙中山则答应只要海军明确表示拥护约法,军饷即由他负责筹备,并先从德国提供的援助军费中取出三十万作为护法海军南下开拔费。程璧光十分欣喜,遂与孙中山“坦然释前怨”^②,决心依附他护法,这是原因之二。

第一次广东护法初期,孙中山对程璧光所率护法舰队寄予极大的希望。7月在广州招待报界茶会上他发表谈话说:“海军握全国势之一半,此次第一舰队宣布拥护共和,即为得胜之兆也”,孙中山自信地预计,有了海军的辅助,再出动一万陆军,那么只须十天就可以打到武昌,把握住中原的要冲,从而迫使冯段北洋政府“非降即逃而已”^③。在给邓泽如的信中他又写道“向来革命之成败,视海军之向背。此次又率海军主力舰队南来,已操制海权矣”^④。护法舰队的南下,也确实对孙中山第一次护法运动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首先,护法海军抵达广州,增加了护法的威慑力量,给北洋政府一个心理上的压力。在近代中国,经济中心主要散布于沿海沿江地区,要有效的控制这些区域,就必须依靠海军的力量。海军舰炮犀利,能有效地协助陆上部队作战,至于战时运输兵员粮弹更需要军舰。历经多次战争的国民党元老李烈钧在总结了以往的经验后指出:“海军举足轻重,得其赞助者胜,失其赞助者败,迭番改革已有明证”^⑤。护法舰队到粤后,海圻、海琛、肇和等较大舰只驻泊黄埔,其余永丰、永翔等分别驻泊省城白鹅潭等处以护卫城市,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海军舰只并未直接参加对北洋军阀的军事活动,但它在精神上给护法人士以巨大的鼓舞,并增添了北洋政府进攻南方的疑虑。1917年7月,皖系密探马凤池在他的间谍报告中分析说,孙中山所持陆军“实力单薄,乌能成事”,但得到海军开往助劲后,“进可以战,退可以守”,孙中山护法的力量就是不可忽视的了。应该说,没有程璧光率部分海军的参加,第一次

护法运动是难以有这样一个声势浩大的开始的。

其次,护法海军在孙中山军政府平定莫擎宇、龙济光的战役中出了力。莫擎宇本是广东惠潮嘉镇守使,1917年段祺瑞许其事成委为广东省长,加以收买,他和皖系臧致平旅合伙进攻护法地区。南下舰队海圻等舰奉军政府令和广东江海防舰队中广玉等舰一起,共同随陆军出发平叛。莫擎宇在水陆夹击下顷刻瓦解,潮梅收复,孙中山特致电前敌对海军明令嘉奖。1918年初,盘踞琼州的龙济光趁孙中山和桂系粤督莫荣新发生冲突的机会,登陆占领阳江一带,势焰猖獗,威胁广州。孙中山立即组织力量反击,原已奉命协助陈炯明粤军、方声涛滇军开辟福建战场的护法舰队又赶赴琼州海峡一带海面游戈,见有可疑船只即行搜查,先后捕获龙济光军小型舰船数十艘,断绝了龙军的各项运输接济。舰队还炮击海口秀英炮台等处,使已登陆的龙军与其根据地海南岛的联系中断,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终于溃不成军,消除了对广州的威胁,因而有人在战后评价“平龙之功,以此(海军)为关键”^⑥。

但是,因为南上海军参加护法的真正动机并非基于拥护孙中山的革命主张,而是出自拥黎反段及解决军饷的目的,所以它在广东期间也给孙中山的第一次护法运动带来颇多的消极影响。1917年的广东,主要存在三种力量:一是桂系,广东督军陈炯明就是陆荣廷在粤代表,在粤军队除少量滇军及地方派军队外,大多属于桂系;二是海军,广东濒海多江,海军力量向为人们所注重;三是孙中山系,孙中山名义上是军政府大元帅,手中并无多少军事实力听从调遣,甚至老同盟会员方声涛所率的一师滇军也态度暧昧不服管辖。但孙中山本身具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在全国有号召力,这是桂系所远远不及的。在这鼎足三分的形势下,对孙中山系和桂系来说,海军的向背就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护法海军是由孙中山动员南下的,但因为孙中山在广东没有可靠的财源,虽分别派员到苏、浙、鄂等地为海军努力筹饷,所得终究不多;而桂系握有两广财政,府库充裕,为了孤立孙中山,陆荣廷指使陈炯明出面每月拨十万洋元充海军饷需,海军遂因此而转向。程璧光、林葆懌等海军将领先是依违于桂、孙之间,以后更“殷殷倾向桂系”,在一系列问题上站在桂系一边牵制孙中山的护法革命大计。

孙中山到粤后,为有力地领导护法运动,首先

急于组织军政府以统一西南各省力量。8月18日,他在黄埔公园欢宴议员,议定迅速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并推选人员起草军政府组织大纲。而同一天,才到广州不久的程璧光在和广东要人讨论护法进行问题时,却提议推荐陆荣廷为西南盟主,“剋日来东,主持大计”,还当场请各要人赞成签名,发电催请。9月1日,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陆荣廷、唐继尧为元帅。次日,陆荣廷即致电拒受元帅之职,声明对军政府所为“概不负责”。程璧光以此为范,也迟迟不受孙中山委任的海军总长之职,孙中山派人再三劝导,并亲偕胡汉民至海圻舰请程璧光就职,程仍坚辞不允,这意味着海军不愿直接受辖于军政府,而是保持着一定的独立性。从当时报纸登载的程璧光、林葆懌等海军将领在各种场合的谈话及通电看,大多是要求黎元洪复位,陆荣廷出任西南各省护法首领,却很少提到拥护孙大元帅。

1918年8月,广东督军陈炯明秉承陆荣廷的旨意,逼走亲近孙中山的广东省长朱庆澜,公然声称广东“不能担负军政府和非常国会的经费开支。”随后处处阻挠军政府的行动。为了保证护法的顺利进行,11月,孙中山系国民党人向陆荣廷提出撤换陈炯明的要求。时陆荣廷正因院系的进攻急需联合国民党共同抵抗北军,遂同意改委陈炯明为讨龙军总司令,并建议推程璧光继任广东督军。这本是一个削弱桂系势力的机会,孙中山军政府、广东公民议会都希望程接任,而程璧光却犹豫不决,一再推辞。陈炯明久久不去,粤督问题迟迟不决,给孙中山的北伐计划带来干扰。孙中山为此十分担忧,他在给章炳麟的电文中分析广东形势时感慨地说“甚至玉堂之态度,亦颇难测”^⑤。11月15日,孙中山决定用武力驱逐陈炯明,命令海军炮击督军所在地观音山,但程璧光怕开罪桂系,拒绝执行,并把护法海军舰艇都调至黄埔,宣布戒严,兵舰附近不准任何船只经过,以防止孙中山直接指挥海军。不久,孙中山侄子孙振兴乘泰山轮送新招士兵到黄埔编制,经过海军戒严线附近,军舰突然开枪射击,当场将孙振兴击毙。本来,在孙中山率海军到广东护法之初,桂系军阀还因畏惧海军的力量而对国民党人“亦不敢显有异同”^⑥,海军到粤后的表现使桂系顾虑顿消,有恃无恐。继陈炯明任粤督的莫荣新变本加厉,竟接连把孙中山派出的招兵人员诬为土匪就

地枪决,使军政府扩大自己直属军事实力的希望化作泡影。孙中山忍无可忍,决心不顾一切拼一下赶走莫荣新。鉴于上次程璧光反对之事,孙中山于1918年1月3日亲自率领少数卫队登豫章、同安两舰向莫荣新督军署炮击,由于陆上滇军及地方派军人都未按令响应而又一次未达目的。第二天,程璧光就以擅自行动为由,把同安舰长温树德、豫章舰长吴志馨撤职,这引起国民党护法人士的强烈不满,孙中山也对海军趋于失望。1月18日宴请滇军第四师官佐会上的演说中,孙中山称粤军和部分滇军属尊重军政府之列,而把海军剔除在外;第二天他又公开批评程璧光等人到粤以后不肯急进,过于小心谨慎,以至使他的护法革命“以最好之机会,最易之事业,亦不能稍有起色。”^⑦愤怒之际,孙中山甚至准备自己亲自统率一支军队北伐,既以此摆脱反护法势力的阻挠,又可以减轻广东人民负担,即使讨饭,也决不再回广州。

积极参与组织“护法各省联合会议”和改组军政府的活动,是南下海军对第一次护法运动所起的最大不良影响。1917年11月中旬,孙中山鉴于西南局势涣散,陆荣廷、唐继尧、程璧光等都不愿到军政府任职,军政府事实上无法统一领导西南护法运动,但同时,段祺瑞政府则对广东咄咄逼人,因此建议组织一个“西南联合会议”,“务期联合西南各省为一大团体”^⑧。按孙中山的原意,这个会议将由西南各省实力派的代表组成,是西南各省军事力量的联络和协调机构,并不是在军政府外另设一联合政府,更不是以它来代替军政府。但陆荣廷等立即抓住这个机会,打算以联合会议来分夺军政府的权力。程璧光附和了桂系的意见,12月底他和莫荣新等联名发表“护法各省联合会议条例”,建议以唐继尧、陆荣廷、程璧光为联合军事代表,而孙中山却只具一个政务委员的空名。这样,所谓的“护法各省联合会议”实际成了“拥护实力派以抵触军政府”的组织。1918年1月20日联合会假莫荣新督军署召开成立大会,程璧光、莫荣新再次联合通电请护法各省迅派代表。联合会议的成立立即遭到非常国会中拥护孙中山议员的强烈反对,他们指责该会超出了军事联络体的范围,“侵夺军政府权限”,甚至“并国会之权而并吞之。”^⑨章炳麟得悉这一消息后也从四川拍电称该会的成立是“乞降之兆”,“观其条例行事,干预宪法,则是倪嗣冲第二也。预派议

和代表,则是李完用第二也”,“早应派遣警兵立时解散”^③。接着,云南代表李烈钧及四川、湖南代表都相继退出,联合会议因此而搁浅。但不久滇桂军阀又与政学系、益友社议员相勾结,提出“修正军政府组织法案”,拟将元首制改为合议制,废大元帅设多人总裁,一句话,即剥夺孙中山的领袖地位。程璧光亦“力赞其议”,并由他出面疏通孙中山同意该法案,孙中山坚持这议案必须进行修订。然而二月下旬,程璧光、唐绍仪等仍正式议定改组军政府办法提交国会,请审议通过。就在此时,2月26日,程璧光在海珠被刺身死。

程璧光的被刺,使海军再次引起国内各派力量关注。段祺瑞的主要助手徐树铮致电刘冠雄(北京政府海军总长),认为南下海军失主,今后有北归或更加接近孙中山两种可能,要刘“务乘此机切实注意,早日下手。”^④为了稳定海军情绪及安慰程璧光眷属,孙中山调程的族侄程耀垣任广东省盐务缉私统领,同时在每月约四十万的盐税收入中拨出十三万元作为海军的可靠经费,南下海军得以稳定,但他们倾向桂系的态度并未变化。4月10日,非常国会以多数通过“改组军政府大纲案”,陆荣廷、莫荣新等立刻致电赞同。虽孙中山明确表示“改组一事,余始终反对,以法律上万难通融也”^⑤,继程璧光任南下海军领袖的林葆懌仍和桂系持同一意见。5月20日,军政府改组,废大元帅,选举唐绍仪等七人为政务总裁。和程璧光一直不就孙中山军政府海军总长一职成鲜明对比,这次军政府改组后不久,林葆懌即宣布就政务总裁职,南下海军和孙中山的关系从这也可窥见一斑。军政府改组第二天,孙中山愤而离穗赴沪,第一次护法运动以失败告终。

事实说明,孙中山所领导的为期十个月的第一次护法运动,桂系军阀的破坏是一个主要原因,但和南下海军的态度也有密切关系。护法由得到部分海军支持而正式兴起,又以这部分海军日益倾向桂系而加速了失败的进程。追随孙中山参加了第一次护法运动的邵元冲在评论孙中山护法失败原因时指出“桂系即使暴横,若海军能坚持护法南下时之主张,则桂系犹将有所惮而不敢恣睢。无如当时之

海军惟利是附,一系桂系之利诱,即不能自坚其初心,桂系遂益得为所欲为矣”^⑥,这是很有道理的。护法运动的失败,使孙中山悟出了旧式海军皆“无才而多坏”的原因,理解到革命不能依靠陆上军阀取得成功,同样也不可能依靠海上军阀得到胜利,产生出“将全国海军根本改革之决心”,孙中山指出,必须着手兴办海军学校,培养“有革命志气”的新式海军人才来担负起国民革命的重任^⑦。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孙中山立志建立一支新式革命海军的宏伟计划。可惜中山先生壮志未酬即于1925年早逝,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海军的未竟之志也只能留待后人去完成了。

注:

- ① 《海军总司令李鼎新等护法宣言》。
-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孙中山全集》第四卷303页、114页、102页、115页、128页、132页、236页、304页、237页。
- ③④⑤⑥⑦ 见《民国日报》1917年6月25日、7月5日、7月23日、7月25日。
- ⑧ 何香凝:《我的回忆》,载《辛亥革命回忆录》一,27页。
- ⑨ 《广东各界欢迎海军之公启》,载《民国日报》1917年8月9日。
- ⑩ 东方通信社电,转自《民国日报》1917年7月24日。
- ⑪ 吴宗慈:《护法计程》。
- ⑫ 汪建刚:《国会生活的片断回忆》,《全国文史资料选辑》八十二辑。
- ⑬ 《申报》1917年7月23日。
- ⑭ 《东方杂志》第十四卷第九号。
- ⑮⑯⑰ 莫汝非:《程璧光殉国记》。
- ⑱⑲ 《章太炎自定年谱》。
- ⑳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第28页。
- ㉑ 《吴景濂函电存稿》中李烈钧致吴景濂信,《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一期。
- ㉒ 《冯国璋往来函电》中龙济光致冯国璋函,载《近代史资料》79年第三期。
- ㉓ 《民国日报》1918年1月24日。
- ㉔ 《徐树铮电稿》80页。
- ㉕㉖ 邵元冲《总理护法实录》,《建国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 ㉗ 《国父全集》第三卷947页。